

法治人物 依法找不回安置地？



张华仍在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洪克非

10年前，长沙的青年农民张华被评为2011年度湖南省最具影响力法治人物，与他一同入选的9人包括副市长、法学院院长、法官、检察官、法医和禁毒志愿者。

湖南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这项评选，旨在提高公民法律素质，弘扬法治精神。主办方认为，这位农民在自家面临拆迁时，能够通过行政诉讼依法维权，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政府部门依法行政。

这种在法律框架内寻求问题解决的做法，应该成为现代法治社会化解矛盾纠纷的理性选择与正确途径。主办方发布的张华事迹材料里这样评价。

10年过去了，张华已经成了一名律师，代理过不少案件，但他自己的维权官司虽然胜诉，却一直未能执行。

我坚信法律能伸张正义，自己也考上了律师，帮很多人打赢了官司，但自己的案子却一直没走通。他感慨。

2005年，长沙开福区近郊建设的青竹湖高尔夫球场，让张华等一些村民面临房屋拆迁。村民对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以及拆迁补偿不满，向长沙市规划局和湖南省发改委举报，多部门对这一违反国务院办公厅针对高尔夫球场建设禁令的行为发出警告，但收效甚微。

张华曾在一家电缆附件厂做业务员，后来回老家结婚，盖了一栋三层楼房，一楼开商店，楼上开歌厅和旅社。但新房盖了不到两年，就要为高尔夫球场让路了。拆迁补偿价格为220元到330元一平方米，张华家的安置条件是12万元货币补偿和划地建房安置。他们收到了12万元，但当时对土地安置并不知情。

2006年6月，张华家收到了长沙市国土局发出的限期腾地决定书。2007年1月，他的房屋被强拆，一家人被搬到一个叫鲇鱼山的地方，在菜地里临时搭建的棚户中过渡。

家里的营生断了后，他买了电脑，拉了村里的第一根网线，购置了打印机和装订机。他还去书店，搬回书里带有行政、土地字样的法律书籍，希望用法律的力量改变家庭的命运。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杨杰

37岁的吴瑕是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的一名法医、一个4岁女孩的妈妈、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毕业生。对于非正常死亡人员，吴瑕是给他们开最后一张证明的人，也是从尸体上找答案的人。

意外有痕，他杀无痕，必留痕迹，这是刑事技术的根基。比如人被捅了数刀，哪一刀是致命的，我们解决的是这个问题。没有最终的死因，证据就不完整。吴瑕没穿警服，也没化妆，头发随意扎在脑后，见生人时不善于展示亲近。

在法医进入现场之前，没有人动尸体。吴瑕刚工作时，去过一个铁道边的现场。那里有很深的绿化带，绿草及膝，平时少有人出没。苍蝇、甲虫，草里已经出蛆，而绿化带的深处则是一具尸体。

出现场回来已是深夜，吴瑕一边吃馒头，一边在投影的大屏幕上展示现场图片。刑科所所长凌巍对那一幕印象深刻，感叹所里来的第一位女同志不一般。

也有一些现场是虚惊一场。万圣节前后有人报告建筑垃圾里有满是血的手臂，法医到场后发现是道具。还有一位醉汉躺在屋里脱光了衣服，气味难闻。亲戚以为他死了，法医到场时据说寿衣都买好了，后来证实是乌龙。

法医大多有过敏性鼻炎，因为尸体产生硫化氢的味道很重，刺激得人哗哗流眼泪。吴瑕曾经手了一起衣柜藏尸案。她和同事多次去现场寻找关键性证据，每次去之前都要做心理建设。案发地在三层，她站在一楼都能闻到味道。

死者和嫌疑人是半路夫妻，从外地来上海租房。出租屋五六平米，有一张床和一个贩卖机大小的柜子，屋外是公共厨房。死者的儿子发现，母亲与家人很长一段时间内只用微信联系，总是挂掉电话或视频，他起了疑，来上海找到房东，锁匠打开房门，发现衣柜完全封死，钉了钉子，贴了胶带，里面除了挂着的女式衣服，有一个

张华首先起诉长沙市国土局，认为那份限期腾地决定是违法的。他打出行政诉讼+复议的系列组合拳，几乎把与拆迁相关的所有职能部门告了个遍，省公安厅、审计厅、建设厅、国土厅、民政厅、发改委、工商局等等，据统计，他发起的行政诉讼100多件，行政复议和信息公开申请200多件。

以这种方式，这位高中学历的农民把政府部门拉到谈判席。

在当时拆迁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张华的做法引起了各界关注。到2011年，湖南省最具影响力法治人物评选时，25名评委中有13人投票给了张华。

2006年，长沙市国土局在向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拆迁张华家房屋时，明确表示对张华家进行自拆自建安置。这符合当时的长沙市征拆安置政策，即长沙市人民政府第60号令，对拆迁户进行划地重建安置。

开福区青竹湖镇新源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安置证明》也明确：接上级政府的指示及居委两委的决定，安排张华家在新源社区鲇鱼山重建安置地，重建地手续齐全，开工在即。

2009年9月28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向长沙市开福区政府、长沙市国土资源局、长沙市规划管理局三部门发出一份司法建议书：我院在审理张华诉长沙市规划管理局规划行政许可上诉一案中发现，张念文（张华父亲）户的重建安置地至今未予落实。建议政府与国土、规划等部门召开联席会议，认真研究解决问题，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司法建议书发出后，石沉大海。

2010年9月9日，长沙中院行政庭庭长在开福区法院三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张华家拆迁安置问题的协调会。参会人员除长沙市、开福区两级司法人员，还有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开福区国土分局、青竹湖镇政府、新源社区居委会等单位的工作人员。

会上，张华根据政府当时承诺的自拆自建安置方式，提出自建安置房。然而，国土部门的答复是，长沙市的征拆安置政策发生了变化，2008年，市政府颁布了新的103号令。103号令比之原来的60号令，最大的区别是从划地安置变成分房安置。政府不再给拆迁户划地安置建设有天的房子，而是要求统一购买安置小区的指标房，同时将拆迁户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将其由农民身份变为市民。

张华当场表示拒绝，他要安置地，不愿意花钱购房住进安置小区。会议协调未果。

张华告诉记者，社区建设的安置小区，实为有法律障碍的小产权房。何况，他是60号令实施期间的拆迁户，政府本应按当时的政策安置他。他们全家都是农民，房屋拆迁后稻田和土地均未征收，不符合成为市民的条件，也不应强制上楼。

张华再次启动了诉讼。2012年7月，他向湖南高院申请再审起诉长沙市国土局限期腾地案，获得立案。2013年11月，湖南高院指令长沙中院再审。

2017年8月，长沙中院判决张华胜诉，责令长沙市国土局对张念文（张华父

亲）户的自拆自建安置采取补救措施。在这份判决中，法庭支持了张华自拆建房的安置诉求，否定了2010年市国土局和镇政府给安置房的方案，理由是，此前市国土局已将张华的安置方式明确在限期腾地决定书中，且新源社区在强拆前出具了《安置证明》，进一步确定了张华一家的重建地位置和手续。

判决书中明确了长沙市国土局的责任。市国土局于2006年9月21日向长沙市开福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涉案房屋被拆除才产生了后续的安置问题。上诉人自2006年10月13日提起行政诉讼至今，《长沙市征拆安置条例》及配套的征收政策均已发生变化，但上诉人市国土局之间就安置问题的行政争议并未实质解决。

2017年9月，张华的父亲因食道癌去世。接替父亲户身份的张华向法院申请执行判决。但2018年5月，开福区人民法院以执行标的明确为由，驳回了张

华的执行申请。随后他多方申诉反映，均无结果。

张华郁闷至极，打了十几年官司，好不容易胜诉，到头来却因无法执行而回到原点。如果执行标的不明确，那上级法院为何要下达一个这样的判决？到底是谁的问题？

他再次起诉了长沙市政府、开福区政府、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局、规划局合并而成）等，要求政府部门落实腾地决定书，中让他在鲇鱼山重建安置地建造安置房的承诺。

这些政府部门应诉答辩中强调，原告户的安置主体应为原告户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即新源社区居民委员会。

被告，变成了新源社区居委会。庭审中，新源社区居委会辩称，张华户已安置，在安置小区为他们留了360平方米的住房指标。

2021年4月8日，长沙中院再次作出判决，责令新源社区居委会对张华一家采取自拆自建方式予以安置。

判决指出，60号令时的拆迁政策，已经为张华这样的被征拆户留出了生产、生活用地，且当时国土部门和社区也对张华作出了划地安置承诺，所以，不管现在政策如何，安置方式都应当是自拆自建。

这意味着，社区应该给张华划一块安置地，而不是分安置房。

截至记者发稿，最新的这份判决书仍停在纸面上。

9月17日，新源社区书记周正伟表示，他看到了判决书，但是履行判决一事，需要请示上级相关领导，以及召开居民代表大会。

对于此前强拆张华家房屋时，社区曾出具《安置证明》表示要划地重建安置，社区副书记周树松对记者表示，那是一届居委会出具的。

我们落实了长沙市中级法院的判决，请他搬进小区的安置房。9月18日，青竹湖街道分管城建的副主任余彬组织街道办、司法所相关人员和新源社区相关干部接受记者采访，多部门人员

表示，如今的拆迁安置政策已变，如果社区给张华划地安置，可能会影响到社区和谐。此前，有的和张华一样在60号令时期的拆迁户，已以安置房方式进行了安置。

长沙市开福区征地服务中心主任曹希告诉记者：对当时的拆迁户，就应当按当时的政策执行安置补偿。60号令拆迁时，政府已经给当地拆迁户留下了两安用地（生产、生活用地），不存在没有土地安置的问题。

据曹希介绍，60号令之前的拆迁安置问题，由国土部门负责。

今年9月6日，张华去了湖南省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由于担心长沙中院的判决在区里无法得到执行，他决定向更高级别的行政部门求助。收到张华复议材料的工作人员对他表示同情，他们表示，将择期协调相关部门商议如何处理。

让张华感慨的是，这些年，他作为法律从业者，经手过很多征拆类案件，多有胜例。办案地域拓展到长沙周边的湘潭、株洲、岳阳等地，甚至有法官、拆迁办主任找他代理案件。但他自己面对的仍是沦为空文的法院判决书，和一块没有确权的土地上的临时棚屋。

打了百场官司，赢了一纸文书。在一份给法院的书面材料中，他这样形容自己：行政诉讼100余件，四分之一的人生在打官司，但拆迁补偿安置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上学的阿富汗女孩

当地时间9月26日，阿富汗坎大哈，阿富汗女孩在学校上学。当地时间8月15日，塔利班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这也是塔利班在美国进入阿富汗20年后，首次重返喀布尔。

女法医办案记

编织袋，上面压了很多猫砂。我们分析这个女的已经死了半年了。嫌疑人和死者生活在一个环境里，所有东西都可能留有痕迹，该怎么证明是他干的？民警把屋里的东西一件件取证，寻找线索。

最终找到一卷残余的胶带，新撕的胶带的头还贴在柜子上。连同封包的胶带，吴瑕和同事通过实验，把它还原成一卷完整的胶带，在上面发现了嫌疑人的痕迹。这证明，就是他掩藏了尸体。

吴瑕说，孤证不立案，法医的工作是不断加强证据的效力。

呈现在法医眼前的是事后现场，过去某个时间这里发生了什么，需要现场重建。这是解谜之旅，也是这个职业吸引吴瑕



吴瑕在实验室工作。

的关键所在。曾经有一位死者腹腔有血，但内脏都是完整的。最终吴瑕在盆腔底下的一根分支动脉上，发现针尖大小的一个口子。那种我终于找到了感觉，经常会有。

法医眼里的细节有时能改变案件的走向。有一位死者倒在浴室里，身上有刀口，他的女友说他洗澡时滑了一跤，正好被剪刀戳中，死了。

吴瑕看了尸体，发现不像剪刀伤，如果剪刀张开，不会只有一个伤口，如果是闭起来，伤口的大小不对。在剪刀上也没有发现死者的痕迹。最终女朋友承认是两人吵架，她从厨房拿了把刀误杀了对方，过失致人死亡。

每一次解谜成功都带来欣慰，用吴瑕同学的话来说，把手里的案子移交出去

时，像老父亲送出嫁的女儿一样。

有了女儿之后，吴瑕的工作离解剖台远了一些。她在实验室做物证检验，还要跟着分析案情。前几天，她收了60多个检材，写了22页的鉴定书。

法医是侦探和科学的结合体。刑科所所长凌巍介绍，杨浦区刑科所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前身叫技术组，有6人，用得最多的是手电筒和小刷子。1995年，升级为技术室，有10人，到2003年，技术力量逐渐显现，扩增到现在的25个民警。除了常规的物证，还在探索声纹、虹膜等采集。

吴瑕小时候的梦想是当科学家，高中想学医，但觉得临床太苦，上海大医院有无穷无尽的人，一切活人可比切死人风险高多了。高考填报志愿报了四川大学的法医学，母亲知道后气得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

她人生中有两个时段以纯粹的学习为乐，一是初中，一是大学。每节课都大开眼界。学医最难之一是病理学。吴瑕读大学时唯一通背的一次是病理考试前夜，知识点浩如烟海，随便一章都能出几十个选择题。之前复习觉得自己能拿80分就可以，考试前夜变成70分就够了。复习到半夜的时候，她想只要及格就行。走入考场，只要考完就解脱了。直到拿到卷子扫了一眼，看到会的题目，才有天亮了那种感觉。

解剖课上，老师指着大体老师说，你们为什么嫌弃他，觉得他脏吗？他在福尔马林里泡了那么久，比你们干净多了，他连细菌都没有。

吴瑕本科毕业后回到上海，考入上海公安学院。这是当地的招警制度，与公务员考试类似，学制一年半，大部分时间在公安内部实习，相当于职前培训。

她办公室里摆着各个版本的教科书，

时不时翻一翻。办公室外是实验室，灯光和仪器组成亮白色空间，一盆植物摆在地上，头顶有灯模拟光照。人工环境让人失去时间的概念，这里是吴瑕的避世所，我能安安静静一个人，手里处理的检材有标准化的程序，不像去现场，千变万化，人处于应激状态。

同事朱文凯是所里最年轻的法医，他说吴瑕喜欢1+1=2的东西。实验跑出来的质量有红黄绿三种状态，一般黄色就可以，她非要做到绿色才行。另一位做物证的女老师金鑫提起她，想到的第一个词是稳妥，她在这里就感觉肯定不会出错，值得托付。

吴瑕不喜欢改变，最好每天有精确到分钟的日程表，按此执行即可。我本质上是死板的人，希望一切在它的格子里乖乖的。

她不喜欢复杂的叙述，包括名著，其实那是人家的文学功底，但我平时用到的文字干脆、精准。律师、教师等职业让她觉得很累，要跟人搏斗的感觉。某种程度上，面对尸体比面对家属的压力要小得多。直视别人的眼睛时会有压迫感，死者的眼睛是没有眼神的，就不会感觉他在看你。

在现场我可以作决定、做自己，但面对别人，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以前我们经常被领导批评，只会跟死者讲话。他们所里专门设计了一张告知单，部分代替与家属沟通。

谈起生物研究的过程，会不自觉变得兴奋，大肠杆菌是世界好员工，不要你给加班费，自己在那分裂、分裂、分裂。

吴瑕生女儿之前，家里有一面墙的鱼缸，里面养过水草，她会调节酸碱值和光照，往里打二氧化碳。她从小就喜欢自然科学，法医主要是医学，但也有昆虫学、植物

学，你得是个杂家。

她在生活里，没有推理、没有恐怖，拒绝一切需要烧脑的东西。我以前看《侏罗纪公园》都觉得好吓人。

工作需要镇静，老师顾虑太多会下不去手。你的目的是找死因。专注于你的谜题，太感性会干扰判断。

当法医久了，看到的现实远比解剖尸体复杂。独居老人是大城市的通病，居委会关注高龄老人，但依然会有真空存在，有时人去一个多月才发现。

吴瑕最看不得的是孩子的死亡。青春期的孩子脾气都挺厉害，这两年常有因为玩手机和家闹矛盾而自杀的情况。

还有社会戾气引起的激情杀人，吴瑕说这类嫌犯总是特别后悔。有单位两个人不对付，一个捅了另一个，自己跳河了，第二天被捕的人活了，捅人的死了。

见惯尸体，吴瑕对死亡比同龄人更洒脱。她结婚后登记了遗体捐献，丈夫说她过分，死了都不愿意跟我理一起。她说，要不你也捐了吧。

她上大学面对大体老师时就决定要捐遗体。我们家人都挺唯物。她的老家在崇明，以前清明回去上坟要坐船，那时上海常起雾，去了码头好几次都出不了。

我爸喜欢花，说要挑一盆把他埋下面，清明拿出来拜一拜就可以了。

吴瑕大学的时候跟同学开玩笑，我死后不知道在哪个医学院迎新招展呢，他们笑她，你怎么知道你是整个儿的。普通人可能觉得这是巨大的冒犯，只有法医能开这种玩笑，前两个星期发体检报告，他们直接说你的验尸报告来了。

大家都知道工作会遇上许多悲剧，但我们努力去淡化悲伤的部分，因为这已经是我们的生活了。